

从“蚁族”到“大象”的路并不好走

在五彩斑斓的都市中,这样一个群体逐渐进入人们视野: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但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相对低端的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他们的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他们生活在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

这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个群体又被称为“蚁族”。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后,在主编的《蚁族》一书中写道:他们是继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由于像蚂蚁一样具有较高的智商,过着群居生活,“蚁族”由此得名。

我们希望每个人的左右,都有着“蚁族”的身影。他们没有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在大城市的边缘,希冀有朝一日能成长为“大象”。然而,从“蚁族”到“大象”的路并不好走,褪去了天之骄子的华丽外衣,这些80后大学生的梦想逐渐归于现实。

“蚁族”的真实生活

2007年7月,还有一年大学毕业的小周从成都来到合肥。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小周很快在安徽省立儿童医院后面的巷子里安置了自己在合肥的第一个“家”。每月房租150元,水电费加起来不超过200元。这个位于市中心的“城中村”虽然价格便宜,但一个小院子里生活了十几口人,只有一个卫生间,处处充满了不便。两个月后,小周和同乡搬到了相对偏远的板桥,两室一厅一卫的房子每月要付450元的房租。两年过去了,小周从当年的“城中村”搬到了青年小区,从北二环的亲家搬到嘉苑苑,从南园新村搬到港澳花园,从科大的校园宿舍搬到桐江小区……成了名副其实的“搬王”。

伴随数十次搬家,是换工作。毕业至今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小周已经换了三次工作,从最初的每月600元到现在的2000元,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回望或深或浅的脚印,小周感慨:一个城市最美的莫过于每一盏霓虹灯。不定的漂泊感让她千万次地呼喊“我想有个家!”



(资料图片)

现在,她只想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向梦想中的生活不断靠近:有个单身公寓,有辆小车……

如小周一样的80后大学生,并非少数。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负责的课题组历时两年,深入北京唐家岭、小月河等大学毕业生聚集村,经过大量的个案调研与54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认为“蚁族”群体的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毕业生为主,税前月平均收入主要集中在1000-2500元。同时,“蚁族”的基本生活消费相对较低,每月的房租平均为377元,饭费为529元,月均花费总计1676元。多数被调查者都处于收支平衡或略有结余的状态。

廉思将这群人的生存状态撰写成专著《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课题组研究表明,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人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该书于2009年9月出版发行后,迅速引起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关注。“蚁族”,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苦并快乐着

毕业之后,生活扑面而来,梦想流离失所,这样的反差令“蚁族”倍感彷徨、茫然。

网友“rongwei123456”说:蚂蚁“高智、弱小、群居”的形象,被赋予到大学生群落,是一种悲哀。然而,社会的就业难题,教育的停滞和困境,使得他们的生活状态一如蚂蚁般的渺小和艰辛。

就业难是摆在“蚁族”面前最棘手的问题。在11月的首场全国秋季毕业生服务周合肥招聘会上,一些要求初中生就可以做的岗位,却有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去应聘。不管出于无奈还是积累经验,在低于千元的薪水甚至“零工资”面前,“先就业再择业”成了大学生们的共同选择。

网友“优喂”的提问有些沉重:面对城市的高房价、低工资和稀缺的工作机会,这个群体生活困苦。可是,当我们关注这些“弱势群体”的时候,应该先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这种现状?

廉思认为,一方面,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很大。另一方面,“蚁族”的形成也受到就业形势变化和就业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社会对高校毕业生需求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赶上毕业生数量增加的速度,毕业生就业的市场需求情况并没有及时为专业设置、招生人数划定的“风向标”,使得许多接受了大学教育但却没有一技之长的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尴尬的局面。

有观点认为,“蚁族”的出现证明“80后”向上流动的机会相对较少,渠道也不顺畅,在社会地位上处于“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尴尬境地。网友“ATM专卖”说:在“蚁族”的背后,是一个社会阶层流动的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而在这样严肃的“理论问题”之外,则是活生生的生存困境,是面包和房租,是交通费和电话费,是娶不起媳妇和养不起爹娘。

大学校门已走出,而社会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敞开,这是一个艰难的必经阶段。安徽师范大学2006届毕业生小张说,远离生养自己的小乡镇,奋斗在大城市,他苦并快乐着。小张表示,面对远未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偶尔有一丝退却产生的时候,更强的声音总会出现在心中,那就是“爱拼才会赢”,风雨过后就是彩虹。

“蚂蚁”如何成长为“大象”

“蚂蚁”如何成长为“大象”

“蚁族”,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尽管没有电视剧《奋斗》中主人公一样的显赫家世,但他们心中却始终有着坚强的信念:“再多的困难我也不会回头”,“人活着,就要不停地往上走”……无数的“蚁族”正在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奋斗”的真正含义,在积蓄力量的同时,他们也希望社会能够在就业、住房等方面给予这个群体更多的政策支持与

实实在在关怀。在廉思的调查中,29.27%的受访者把“平等的工作机会”作为希望政府提供帮助的首选,其次是“住房政策的倾斜”和“平等的户籍政策”,还有“医疗政策的倾斜”、“职业技能的培训”等其他方面的要求。

让“蚁族”有一个相对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是社会的责任。媒体评论员魏英杰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大背景下产生的“蚁族”现象,关涉地区差异、高等教育、大学生就业、房地产价格等诸多社会问题。而一个城市怎样对待外来人员,既能够体现这个城市的襟怀与底蕴,同时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城市管理者首先应该设法让这些群体获得相对低廉、卫生的居住环境,条件允许的话,还应当建造若干廉价公寓,使之成为“蚁族”居住和工作的“中转站”。

处于“生存之上,生活之下”状态中的“蚁族”,不该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蚁族”的青春与梦想,需要整个社会的呵护与关爱。各级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创造平等的就业环境,更科学地对接高等教育与就业需求;关注“蚁族”就业质量和实际生活状况,尽快地将低收入大学生纳入保障行列,在廉租房、医疗、技能培训和就业信息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扶持政策。

据新华社



(资料图片)

新闻时评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 szzw@zynews.com

哥本哈根大会不应只是童话

12月7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正式召开。这次会议一直被寄予厚望。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童话王国丹麦,达成一份可以取代《京都议定书》的《哥本哈根协定》,近乎一个童话。

我们已身处一个全球变暖的时代。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点,对人类的全部意义,才有可能在这个时代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促进自身发展。而如此宏大纷繁的议题,不太可能通过一个没有太多现实约束力的会议立刻得到实现。

各国似乎正“同会异举”。就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美国、印度、德国等国纷纷宣布了各自的减排目标。光有承诺远远不够,而且,在峰会上白纸黑字的协议中谁该减排,该减多少仍将是一大焦点。与此同时,增加绿色能源开发利用,建设堤坝防止洪灾,低海拔岛屿国家民众大迁移等等,都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谁来买单将成为峰会面临的又一个艰难的热点问题。

虑及上述种种难题,很多人都不看好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果真如此,全球应对变暖的努力将遭遇一大挫折。但是,哥本哈根并不是最后的机会,一场失败的峰会,如果没有值得写入历史的成果,或许也可以刺激世界更加珍惜下一次机会。

对中国来说,参加哥本哈根会议应该成为一次真正认识全球变暖问题的宝贵机会。我们应超越这次会议,认识到当今时代,全球变暖所造成各种后果正在逐渐展现,绿色能源和绿色经济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这个时代,中国已不再是10多年前《京都议定书》刚刚诞生时的那个中国,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所面临的压力也日渐增大。

时代变了,观念也需要跟着改变。只有充分认识到全球变暖时代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才能在这个时代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和长远发展,为世界作出贡献。

时至今日,对于全球变暖及其危害仍然存在争议,甚至还有人认为,全球变暖说不过是个阴谋,目的是为了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此类利益之争提醒我们,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清醒判断和深入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全世界变暖问题上掌握话语权,而且是对未来的投资,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变暖的时代里未雨绸缪,先行一步。一些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某些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超前认识到了相关技术在全球变暖时代的重要性。观念的超前,加上资金和技术,就变成了经济上的领先。

在全球变暖的时代里,需要改变的还有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历史已表明,高污染、高能耗的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且需要付出沉重环境代价。当然,眼下我们仍有赖于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以维持经济增长。但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保护环境,为了不再次落后别人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应对全球变暖,并不是为应对外部压力,而是为了我们自身的长远利益。

党建军

“雷局长”要管多大的事儿

安徽霍邱县临淮乡淮河大堤上,生活垃圾绵延至少400米,大冬天里也苍蝇乱飞。记者在县政府办公室电话采访了雷庆明局长。当记者表明来意时,雷局长当即回应称“这么小的事你找我啊?”(《新安晚报》12月7日)

连续一个星期,每天至少有5大车的生活垃圾倒在这里。淮河道垃圾遍地,绵延至少400米,大冬天里也苍蝇乱飞,这显然不是什么小事。但在该县环保局局长的眼里,如此垃圾管理不力已严重涉及环境污染的事情,从群众怨声载道到引起媒体关注,却成了“这么小的事”,让人在遗憾之余不免生出几分感慨。

“这么小的事你找我啊?”这显然是一句顺口而出的“推辞”,本身或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恰恰是从这样“下意识”的态度,可以让人窥见某种不良的行政管理作风。而事实上,接下来的“局长语录”大抵也就让雷局长若揭了:“淮河污染的事情,您觉得很小吗?”面对记者的疑问,雷局长支支吾吾,没有正面答复,只是称“垃圾处理应该是建设部门的事,只有规范化的垃圾处理才归我们管”。可是垃圾进入淮河就会产生污染,这跟你们环保局也没有关系吗?”面对记者的追问,雷局长始终强调一点,“这事不归我们管,这是建设部门的事情。”

从“这么小的事你找我啊?”到“这事不归我们管”,

我想,不仅仅是一个侧面折射出的“雷局长”个人的“姿态”——局长的态度当然不能简单地与环保局的执法管理责任画上等号,但反过来,局长都不重视,何况是他的下属?局长都认为“这事儿太小”、“这事不归我们管”,环保管理执法又怎么能跟进。而既定的污染现状,其实早就证明了一切。

“这么小的事你找我啊?”倒是令人郁闷了,不找你我该找谁呢?进一步来说,既然是“这么小的事”,局长大难道就不该管吗?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群众利益无小事”。什么是群众利益?人民群众既有长远的幸福追求,又有十分具体的生产生活琐事;既有共同的根本的利益,又有眼前的个别的需求。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由无数个小事、个别利益构成的,看似琐碎,实则重要——就事论事,局部垃圾的排放看上去事儿不大,但影响却很深远,即污染环境又损害民生,作为职能执法部门,岂能懈怠?倘若这样的“小事”都不管,局长该管多大的事儿呢?

群众利益无小事、公共利益无小事、国家利益无小事,这些话几乎是天天在讲。但在某些地方和个别部门,真正要落实到实际中去的时候,就被异化成了“这么小的事”和“不该管的事”,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推诿扯皮,请恕我直言,这种官僚作风实在是害不得。 陈一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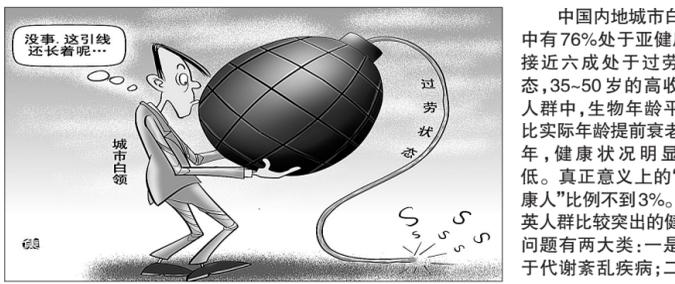
我想,不仅仅是一个侧面折射出的“雷局长”个人的“姿态”——局长的态度当然不能简单地与环保局的执法管理责任画上等号,但反过来,局长都不重视,何况是他的下属?局长都认为“这事儿太小”、“这事不归我们管”,环保管理执法又怎么能跟进。而既定的污染现状,其实早就证明了一切。

“这么小的事你找我啊?”倒是令人郁闷了,不找你我该找谁呢?进一步来说,既然是“这么小的事”,局长大难道就不该管吗?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群众利益无小事”。什么是群众利益?人民群众既有长远的幸福追求,又有十分具体的生产生活琐事;既有共同的根本的利益,又有眼前的个别的需求。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由无数个小事、个别利益构成的,看似琐碎,实则重要——就事论事,局部垃圾的排放看上去事儿不大,但影响却很深远,即污染环境又损害民生,作为职能执法部门,岂能懈怠?倘若这样的“小事”都不管,局长该管多大的事儿呢?

群众利益无小事、公共利益无小事、国家利益无小事,这些话几乎是天天在讲。但在某些地方和个别部门,真正要落实到实际中去的时候,就被异化成了“这么小的事”和“不该管的事”,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推诿扯皮,请恕我直言,这种官僚作风实在是害不得。 陈一舟

过劳是祸首

疲劳、失眠、心理障碍等亚健康问题严重,这类疾病形成工作压力紧张、经常加班等压力因素之外,长时间上网、应酬过多、饮食不科学、作息无规律、缺少体育锻炼以及家庭不和睦、精神压抑等都是重要因素。 焦海洋 文/图



王鸿举主动请辞让人尊敬

12月3日,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接受了多次向中央提出要提前退出领导岗位的原重庆市长王鸿举辞去市长职务的请求。王鸿举,之所以要在现在提出辞职有三个原因:一是年龄大了,这是自然规律;二是在经济危机面前重庆经济已经开始复苏,现在时机好;三是重庆有这方面的干部。(12月6日《华商报》)

在多少官员削尖脑袋为仕途时,王鸿举主动请辞市长职务愈加显得具有深意。重庆,作为中国的直辖市,其市长位子的那份荣耀和光环,不知萦绕着多少官员的梦想与追求。可就在经济危机即将过去,重庆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时,王鸿举却主动让贤,并向组织推荐更合适的人选,还要到会场亲自宣读辞职报告,这种识大体,顾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名利的作风让人尊敬!

王鸿举曾先后与三任重庆市委书记搭档,几乎参与了直辖以来重庆市的全部

重大决策,为重庆市的建设、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按理说,就凭这些“资本”,即便在退休之前不出任何成绩也没有人会说出什么。更何况对于一个已“习惯”了万人拥簇的老人,这突然的提前离职带来的怅然也是需要勇气适应的。

王鸿举主动请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自我的正确评价和认识,更彰显出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负责,而不是从自我的利益出发!面对王鸿举的主动请辞,那些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茶不思饭不尽的官员恐怕应当反思,也应补上这样一课:我们做官到底为了什么?

从王鸿举的主动请辞产生的舆论效应来看,王鸿举的精神境界当然值得广大干部学习,但问题是单靠个别干部自身素质和思想境界来维护干部用人性循环还远远不够,因为这样的愿望往往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撑,很容易中途流产。 赵国旗

“砒霜门”滥用程序的权力何来无辜

“砒霜门”一波三折,至今扑朔迷离,让局外人难以摸清门道。事态进展至今,又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一个是海南省工商部门开始承认自己的在执法程序上存在问题,但同时又表示“是工作疏忽,但不是故意违法”;另一方面,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睺眈最近接受记者采访,表现得有些与权力惺惺相惜,他称“也许海口市工商局也是个受害者,这不是闹剧,是有人策划的,我认为这是蓄意的”。(12月6日《扬子晚报》)

海南工商部门承认执法程序违规,但强调是“工作疏忽,但不是故意违法”,加上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睺眈也认为,这一事件幕后可能是竞争对手故意送存在问题的样品来抹黑自己,这样,海口市工商局就似乎情有可原了。

问题是,现在媒体曝光的有关情况表明,海口工商部门至少在三处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一是对农夫山泉等产品进行初检后,并未将初检结果告知相关企业,侵犯了企业的合法权利;二是违规发布消费警示,而这种权力本身是由卫生行政部门公布,海口工商部门没有这种权力;三是,在农夫山泉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了复检,而复检本应由企业、工商部门和检测机构三方共同进行。这三项程序上的违法,每一项都有可能让最终的结果逆转,连遭三次,还能说他们“无辜”,也是个受害者吗?

作为执法部门的工商部门恰恰要主持正义,要在他的故意策划的行动中,发现破绽,伸张正义。这种主持正义的方式,就是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比如送检的样品要告知当事人,让当事人有申诉的权利,不轻易发布消费警示等等,严格遵守程序,就能避免他人对农夫山泉的陷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法学家道格拉斯才说:“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如果“砒霜门”本身存在某些人的故意陷害,而海口工商部门违反法定程序,那就是公权力的助纣为虐,这样违反程序的公权力根本没有“无辜”可言。

所以,追究海口工商部门是否存在故意的“执法违法”当然重要,但是,即使不存在“执法违法”,只是在执法程序上的违法,同样也必须严格“问责”,不存在丝毫的“无辜”可言。因为,执法程序的弦不绷紧,今天的农夫山泉,统一企业为其所害,明天,将会有更多的企业和公民为这种滥用程序的权力所害! 杨涛

电动新国标是在“意淫”人

最近,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公布了《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安全要求》:将40公斤以上、时速20公里以上的电动车划入机动车范畴。该标准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

据说,全国约有1.4亿人出行靠电动车,我也是其中之一,作为电动一族,聊发几句感慨。

新国标是在“意淫”老百姓。活生生把俩轱辘的东西当四个轱辘的机动车来管理,实在是老百姓的嘲讽:老百姓省吃俭用买个电动代步工具,却非要“被机动”地按照20公里的时速“优哉行歌”,就是要你活生生把两千三块钱的电动车当做三四百块钱的自行车来用。

新国标是在“意淫”交管部门。一旦此项国标明年实施,可以想象,全国1.4亿辆电动车“名正言顺”、浩浩荡荡地“驶”上快车道,那是多么一个壮观的场面啊!恐怕要“直把都城变堵城”,交警还不累得腿酸,忙得屁颠? 新国标是在“意淫”车管所。一旦电动车“升格”为机动车,免不了要考驾照、办保险。除了让有关部门平添一笔外财,恐怕更少不了新一轮怨声载道。单说考驾照,就是个21世纪新天方夜谭,让那些坐汽车的考我辈天天骑电动车的人,指定谁考谁呢?是不是还要出台一个考电动车驾照的新国标,教人怎么“挂挡”?怎么“刹车”?挂牌时再推出吉祥号码,推出选号费,挂牌拍卖一番,财中生财,拉动GDP?

而对于众多电动车生产商和销售商来说,新国标的杀伤力就不仅仅是“意淫”了!无需多言,全国超2000家电动车生产企业将变成无证生产的非法企业,超过500万就业工人将面临失业,以及数不胜数的经销商,都必将遭到“灭顶之灾”。

之所以说新国标是在“意淫”大家,是因为这个“东东”很难实施和操作。或许它只是一只“氢气球”,先“小心翼翼”放出来试试探民意。果不其然,这两天,“有关部门”很知趣地知难而退了,又有新的消息在跟进:先是中国自行车协会负责人说将申请暂缓。昨天,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负责人又表示,这一标准仅是推荐性标准,并非强制执行,执行的具体情况如何以及会产生什么影响,还要看交警部门出台的细则。

呵呵,从这个终端消息来看,究竟是谁“意淫”了谁,岂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党贺喜